

羅斯福遠東政策的失誤

范興國

中國赤化與韓國分裂的禍根

七樁決定塑造了歷史

現代史者的參考。

二次大戰後的遠東

桑姆納威爾斯以「七樁決定塑造了歷史」，做爲書名，意在使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所作的七項決定，如何形成了其後的真正歷史，根據史料與他本身的閱歷見聞，作了一番深入的敘述，如他分析羅斯福承認法國的維琪政府、珍珠港以前的遠東政策、拯救新世界的聯合途徑、大戰結束前創設了聯合國、耽擱決定戰後世界的政治與領土問題、以及從珍珠港到廣島的遠東政策等等，寓意都極深長。尤其是「從珍珠港到廣島的遠東政策」一章，特別涉及羅斯福總統如何邀請蘇俄參加遠東的對日作戰，以中國的大連港作爲許諾，由雅爾達密約的延伸，造成了美國對中國的壓迫向俄讓步，而招致中國大陸的淪共。他特別就羅斯福總統這項決定的背景，根據他個人與羅氏極爲親密接近的關係，並且自始至終，他都周旋羅氏左右，參與密勞，說明真相；此與我國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有可貴的相互發見之處，其中得失巧妙足供吾人玩味之處頗多，特願引述並加上個人的分析與看法，以供治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向盟國投降，簽字在美國的米蘇里軍艦上，這時可說是美國的軍事力量確實掌握了太平洋。日本散置在中國大陸的軍隊，分別向中國及蘇俄投降；東南亞一帶的日軍，則向英國蒙巴頓勳爵（聯合國部隊的統帥）投降；太平洋上從阿留申到菲律賓一線的戰略島嶼，都握在美國的手中，而距離日本不到四百海哩的琉球，則成爲美國的軍事堡壘。

對日本本土，經戰勝的盟國同意，實施軍事佔領，由美國麥克阿瑟將軍出任佔領日本的軍事統帥。

在中國大陸，國民政府正在勝利還都的熱潮中，蔣委員長由於得到美國及蘇俄約定的援助，即將面臨如何克服中共的內鬨。

對韓國來說，開羅宣言中，對其土地的完整與獨立，已有承諾，即聯合國在韓國人民尚不能履行其爲一個主權國家的義務與責任之前，將由中、美、英、蘇四國予以託管。

雅爾達協定，其中有關遠東的幾點協議，是能够阻止戰後主要盟國間的矛盾衝突，如莫斯科與華府，及莫斯科與南京之間，似乎都會令人有着不無懷疑之處。

日本的侵華與入侵東南亞，激起了這一地區高漲的民族主義。從印度到印尼，緬甸到馬來亞，中南半島到中國大陸。由於民族主義追尋獨立與自由，自亦受到聯合國憲章及美國民主精神的鼓舞，而波瀾浩蕩。

可是，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祇有五年的时间；從日閥在美艦米蘇里號上的簽字投降，至美國軍隊打着聯合國的旗號，奔馳在韓國的戰場上，爲遏制蘇俄挑釁以及中共大舉參戰的一場戰爭，而傷亡流血；中共控制大陸，仇視美國；國民政府遷往臺灣。美國在此衡情度理，需要幫助中南半島、印尼、緬甸及馬來亞等非共政府國家，以免繼續爲赤化的惡運所波及。

特別在這一時期，俄共師法希特勒「撒大謊」的故技，利用宣傳及聯合國的安理會，誣指侵韓戰爭係發自杜魯門，而非史大林。又如蘇俄欺騙亞洲人民說，阻擾韓國統一與獨立的，就是「

華爾街的戰爭販子」。而且此時之亞洲地區國家除日本外，餘均在饑餓、痛苦、恐懼中掙扎，較之五年前並無不同。

人們乃提出這樣一連串的問題：這些結果是否由於羅斯福總統在開羅、德黑蘭及雅爾達會議所作的決定所引致？抑或彼時羅氏已患病，或因其無能有以致之？

抑或羅死後，與美國所推行的遠東外交政策攸關？抑或一九四五年春季以後，蘇俄世界政策的轉變？或否應歸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與蘇俄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導致？

到底真相如何？桑姆納威爾斯乃就一九四三年九月間的一個星期天，在海德公園應邀為羅斯福總統的貴賓，與之接觸所得到的理解，作一敘述。

他說羅告訴他，在遠東方面，宜切斷法國對中南半島的控制；使聯合國託管菲律賓，將使非扮演重要角色。又說他與荷蘭女皇威廉明娜及其政府官員接觸，乃知荷蘭將於戰後謀求合理解決荷屬東印度之法，以使印尼人民加入荷蘭的邦聯，惟此議為邱吉爾所反對，羅亦同情邱，乃表示毋論將來印尼是否為一單位或瓜分，必將走向完全的自治。

估計錯誤出賣中國

話題轉到中國，認為這是遠東令人困惑的關鍵。羅對中國人民，懷有一顆友誼的關心。強調美國的遠東政策，預料將建築在中美政府密切合作的關係之上。而提及他最近與中國領袖蔣委員

長之間，發生了若干的困擾，因此乃稱蔣委員長為「高度倔強」（“Highly Temperamental”）型的領袖人物。又狀述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缺乏效能，實堪憂慮。美國此時對中國的救濟與援助，已是盡其所能。而其中有時將援華物資，轉送英國，惹起中國政府的憤怒，亦屬不得已。羅氏特別述及，蔣委員長可能囿於他的軍事觀點，他以中國領袖的資格，指揮他的軍隊在中國土地上與日軍作戰，是游刃有餘；然而他能否

深服戰後的中國民心，值得研究。美國對中國提供了相當大的援助，惟對目前蘇俄公然支援中共，對抗國民政府，應謀求對策。為此，羅氏乃思如何盡力調和國共之間的差異，期使蔣委員長可以專心抗日，不必分神又與共軍作戰。

羅氏最大的恐懼，就是擔心日本戰敗後，中國又接着爆發內戰。蘇俄為其利益支持中共，西方列強為其自身利益，被迫支持反共的一方，這便是危機所在。

羅氏分析這一情勢，他說這頗似過去西班牙的內戰，越是大規模的內戰，越是帶來鉅大的危險。在他的思想裏，再也沒有較中國戰後所引發的困惑，更為嚴重的了。除非中國很快得到來自國外的幫助，復興她的國家經濟，並醫治她長期抗日中所受的創傷。而且中國也需要與莫斯科締結穩固的友好協定，此可阻止蘇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想干預中國國內事務的念頭。

本書作者桑姆納威爾斯，在其與羅氏談話中，提醒羅氏謂，美國政府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來美京華府之前的春天，羅氏曾向蔣夫人保證對國

民政府的地位承諾，認為中國若不能收復日本佔領的失土，以及從列強手中取回過去的失土，包括香港在內，那就不會有安定的遠東。

羅氏記憶起這樁事，並說當時他的這項對華承諾，甚難說服邱吉爾，以及任何英國政府。因為英國也是戰勝的盟邦，她的擁有香港，即是一個世紀前根據和約，向中國取得殖民地。至於臺灣，自應歸還中國，但在這一安排中，須要包括在臺灣建立一個戰略空軍基地，俾使聯合國執行其警察的權力。他特別強調臺灣在加強太平洋的和平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桑姆納威爾斯深刻記憶當時詢問羅氏，是否畏懼蘇俄可能要求一些在中國的權利；如一九〇五年俄日之戰，俄國戰敗，曾將若干掠自中國的失土，轉讓給日本。羅乃答稱：蘇俄當然要求歸還以前因樸資茅斯條約所割讓日本的千島羣島與南庫頁島；但是希望蘇俄不會要求在中國東北享有更多合法貿易的便利。羅氏當時擬建議以大連為自由港，來滿足蘇俄的上項要求。（按：在世界許多地方，設置自由港，即為解決當地的國際紛爭；例如德國北部的基爾港。這是羅斯福所喜愛解決問題的公式。關於建議大連港改為自由港，在幾個月後，羅便在德黑蘭會議中，告訴了史大林。）

關於韓國的問題，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季之前，羅曾告訴桑姆納威爾斯，韓國應經由中、美、英、蘇與加拿大的共同託管，而重建為一個獨立共和國。

綜結羅、桑兩人一九四三年九月的說話記錄

其對戰後遠東的整頓，無非想運用美國的影響力，達到下面幾個目標：

(一)恢復中國領土完整，即中國以前為外國所征服與強取的土地，應歸還中國。

(二)支持中國的國民政府，為唯一能夠統一中國及防止長期內戰的政府。

(三)取得中國與蘇俄的承諾，即預防蘇俄干涉中國的內政以及侵犯中國的領土。

一個月後，即一九四三年的十月，羅斯福欲往開羅及德黑蘭會議之前，桑姆納威爾斯又與羅氏在白宮會談，羅氏提到他曾一再說服邱吉爾，應視中國為四強之一。因為戰後主要盟國從事維護和平大業時，中國當與之合作。可是邱吉爾的意思，竟認為和平大業祇有單獨依靠說英語的強權國家來完成，即舍英美其誰乎？對蘇俄的介入此一和平大業，亦極為勉強首肯。羅氏深知邱吉爾腦中仍然盤據着大英帝國的光榮往史，不願看到她在本世紀的轉向沒落，乃盡量開導邱氏，說西方世界為了其自身的安全，必須捐棄以往成見，不可視亞洲人為次等種族；現在必須開始真心全意對待中國，乃為防止分裂西方與東方的最佳辦法。

桑姆納威爾斯走筆此處，他感到有一點奇怪，就是他看過不少有關羅斯福總統參與的會談紀實，國際會議紀錄，尚無發現羅斯福總統對其世界戰略的主要目標，有過荒唐不稽的舉措，然真實而尖銳的傾軋摩擦，却發生在羅斯福與蔣委員長長的政府之間，乃加以研究，下面便是他的看法：

當羅斯福總統對佔領孟加拉灣內的安達曼羣

島，視為緬甸戰役一個部分的諾言，予以變更後，美國特別擔保的對華軍事援助，時而中斷；遂引起蔣委員長與史迪威將軍在重慶強烈的爭執，蔣委員長堅決表示，不克容忍美國的戰略參議；於是華府與重慶之間，雙方不免發生隔閡與埋怨。然而，後來羅斯福總統一再派遣私人代表來華，拙劣地致力勸告蔣委員長要答允中共的請求；由是滋生更多的誤解，也同時傷害了國民政府的權威與尊嚴。其間，實在由於羅斯福總統的那些代表，都是一些茫然昧中國國情與缺乏遠東事務經驗的外行，他們幫了羅的倒忙。羅的這些來華代表，他們不是大部分時間在相互爭吵，就是與所轄部屬發生衝突爭執。據桑姆納威爾斯的了解，這些代表不是不想替羅盡力，實現羅的訓令；進一步建立一個戰後強大的中國。惟基於他們錯誤的判斷，以及他們各自建議的巨大差異，遂不得使羅斯福總統難以獲得精確綜覽全局的估計。

更糟的事，就是駐在重慶羅的代表，竟拍電告羅，要羅重提在雅爾達時向史大林所作的建議，即拒絕國共的合作所引起的責任，較之共產國際與國民黨，更甚於中共自身。羅氏接到此類錯誤的報導，既不能修正原定的政策，又不能改變當初構想——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戰後中國。

根據桑姆納威爾斯的了解，他說羅斯福對國民政府的援助，自始至終都很堅定。而且在羅的指示下，所運送中國軍火總數以及物資援助，數字也相當龐大。

然而與羅之遠東政策，背道而馳的，乃是史與史大林在雅爾達所簽的協定，將中國出賣，這

一點實對美國的戰略地位，嚴重有損。

吾人可以追溯這段歷史，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及同年的十月，史大林均曾公開宣告，一俟德國戰敗，蘇俄即行參加對日戰爭。蘇俄的這項保證，於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還一再向美國駐在莫斯科的大使諄諄相告。

根本勿須蘇俄出兵

可是太平洋戰爭的早期，盟軍對日戰爭，是戰線的拉長與極其艱苦的戰鬥，幾乎完全在無外援的情況下，以求盡力控制太平洋，蘇俄並未在此適當時機加以援手，足見其對日的參戰，殊無價值。所以一九四四年的秋季，羅氏幕府中對戰爭的看法，產生了一個非常突出的結論，即日本現已面臨整個意志與精神的瓦解崩潰之中；因為盟國的海、空軍業已做到完全對日本本土的封鎖，無須美國軍隊的侵入日本本土，不久即可導致日本的投降。

羅氏幕府中高級幕僚，李海上將（Admiral Leahy）頗為傑出，他建議美國應當自制，繼續以海、空軍封鎖日本，佔領菲律賓以及中國大陸沿海的幾個戰略據點。在另一方面，美國的軍方，當時的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却堅持作戰的開始，要配合美國兩棲部隊，攻佔其南部的九州島，再前進佔有日本本土的主要島嶼，這樣才可以武力壓迫日本投降。

上述兩種尖銳對壘的根本歧異見解，羅斯福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會晤邱吉爾於第二次魁北克會議之前，對羅相當困惑，不知所擇。但在魁北克

會議中，經過全盤檢討，英、美聯合軍事參謀首長却指出，蘇對德戰爭，所以將德戰敗，應歸因於英、美兩國配合蘇俄的軍事行動，曾將兩國一切可能運用的實力，完全投諸反日的戰爭。他們並且測定一個最後戰勝日本的日期，大約是在德國失敗後，還得花費十八個月的時間。這樣一來，李海上將的建議，便為這些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所漠視了。

羅氏是否採用聯合參謀首長的建議，因為他們的建議，實際代表英、美高級軍事將領慎思熟慮的決定，像馬歇爾將軍的戰略，便一貫主張要爭取北非及歐洲戰場的輝煌勝利；而對侵入日本本土的作戰，在此過早的時機，由戰略的假想可知，勢必犧牲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

關於此點，可從戰後在東京審判戰犯紀錄中得到證明，根據日本戰時的有關主管官員的口供，日本都佩服李海上將的建議，因為日本已無再戰之能，即使沒有盟軍的攻擊，它也無法持久。至於聯合參謀首長的建議，根本上就是一種對現狀事實的誤解。那麼，這兒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試問一個幾乎完全屬於技術性的軍事戰略，兩國政府的高級聯合參謀首長，正式將其建議呈遞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時，羅氏是否會發生忽略情事。

根據桑姆納威爾斯的研究，他認為羅氏的決定在前。因為他有了決定，所以才可以在幾個月以前所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中，拿他的決定，作為研商軍事與政治計劃的基礎。這也就是羅氏最高的自我約束，採取每一可能的步驟，來保證其軍

事行動的勝利，並盡量減少美國士兵的犧牲。他的軍事顧問所堅持必須得到蘇俄的援助，不僅包括運用蘇俄的軍隊，攻擊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軍；也要使用蘇俄的領土，作為美國空軍基地。

羅氏在雅爾達告訴史大林，他希望攻佔日本本土，或為不必然；但是日本仍有四百萬武裝的部隊，若無強烈轟炸其本土，日本的失敗，便無法預料。為此希望蘇俄提供軍事基地，史大林乃應允美國可在蘇俄的柯索摩斯克及尼可勒夫斯克兩地，設立空軍基地；史並表示美國還可在蘇俄濱海地區，增設幾處基地。

史、羅兩人又私下協商，史乃向羅提出所謂有名的蘇俄的遠東要求事項，大致是：蘇俄希望獲得長期租借中國的旅順港；設置大連港為一自由港；租借中國的東北鐵路；及維持外蒙古的繼續自治；並將日本所有的庫頁島及千島羣島割讓給蘇俄。史、羅密議六個月後，史大林又向在莫斯科的美國總統代表亨利霍浦金斯強調，一俟戰爭的災禍過後，必須對蘇俄人民交代一個如何蘇俄重向日本作戰的理由。因此乃要美英兩國擔保中國將會同意承諾蘇俄的要求，乃為蘇俄參戰的先決條件。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竟先後相繼同意。

由於羅斯福製造了雅爾達協定，美國的外交與論對羅評之為「出賣中國」以及損毀了美國在遠東的戰略地位。

巴德溫的深刻評析

紐約時報軍事專家巴德溫，一位極負時譽的

學者，在「最大錯誤的戰爭」一書中，有下列描述，記載他對雅爾達的批評：

「在雅爾達的美國代表們，簡直是令人驚訝拱手奉獻別人的土地給蘇俄，他們這種讓步，傷害到一個盟邦的主權。此種政治的錯誤，其來也有自，於今為烈。所謀既非美國利益，亦非中國及世界之利益，無故乞靈蘇俄參加太平洋戰爭，端將蘇俄造成太平洋的強權。仔細端詳，亦非軍事上的考慮，影響了政治的判斷。因為在雅爾達會議時光，日本業已戰敗，並非基於原子彈，這時原子彈尚未製造成功；亦非基於傳統的轟炸，可是基於戰爭的封鎖及消耗，日本敗象已露。尤其是對日本的危亡情況，英美當局，早已熟知，然其軍事將領竟懷於日本因防禦而引發的猛烈戰鬥，在戰略形勢使日本面臨絕望下，反而彈出極為悲觀的論調。」

巴德溫最後結語說：「蘇俄在雅爾達成就了一筆大交易，史大林應允在對德戰爭結束後的十天內，參加對日作戰，就為了這一參戰，蘇俄獲得了千島羣島、旅順港、一個蘇俄控制的大連自由港、中國東北鐵路的一半權益，此即形成蘇俄在重要東北亞地帶的戰略霸權。」

巴德溫的假定，第二次魁北克會議及雅爾達會議中，英美高級聯合參謀首長，乃犯了基本的軍事錯誤；我們也可以想像巴德溫的此一感受主張，即蘇俄不曾參加對日作戰，史大林便要求無門了。然而一九四五年的情勢，人們普遍相信未來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寄托在蘇俄與西方的攜手合作之上。而蘇俄對領土的要求，多為西方國

家所姑息。若是，史大林把他的那些要求帶到戰後的和平會議上，英美又焉能拒之。我想，這是桑姆納威爾斯在爲羅斯福總統所犯的罪愆，開脫之辭。如無羅對史承諾的雅爾達秘密協定在前，戰後的和平會議上，史又怎能厚顏巧取豪奪。不過，歷史終成歷史，在過往的歷史舞臺上，仍然可以找到提供後人的智慧，引起人們探討的興趣。

桑姆納威爾斯懷疑巴德溫進一步的假定，羅斯福默許史大林的要求，便犯下一樁根本的政治錯誤，他舉例一九五〇年八月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會議中，有五位共和黨的參議員以怨憤的口吻宣稱：「我們現代的悲劇，即是一九四五年對認知蘇俄統治者的目標與方法的失敗，以及拒絕美國的領導。」同時，他一再不嫌煩地說明他所熟知的羅斯福總統，對戰後遠東政策的規劃，乃是以美國的利益，中國與世界的利益爲着眼，聯合中國人民及建立一個戰後強大的中國，爲其基本信念。並竭力貫徹這項信念，促使莫斯科與中國國民政府之間產生穩固的協定，擔保史大林對國民政府的支持，並不干預中國的內政。後來羅的此項信念，對中國的統一，成爲泡影；與邱吉爾所曾反對承認中國爲四強之一的言論，都遭到批評。

然而一九四五年，羅氏對其軍事首長所作建議的選擇，不能不說對中國人民在亞洲建立強大的國家，是一失算；並使之陷入無邊的戰亂之中，蘇俄在遠東坐大，中國沒有制衡的力量。戰後盟國解除日本的武裝，使這個海島帝國變成遠東

的瑞士；一面使中國虛弱，又不武裝日本，整個遠東以後的命運，不想可知了。

威爾斯爲羅氏辯護

桑姆納威爾斯並不以一九四五年羅氏抉擇其軍事幕僚首長的建議，對爾後亞洲和平的建樹，許以過分成功的希望。他在一九四六年撰有「我們應向何處去？」一書，他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個觀念：

「蘇俄政府祇要能確實掌握她西伯利亞幾省的安全，她之佔有南庫頁島與千島羣島，乃屬必然之事。因爲上屬兩島，原係日本取自蘇俄。至於大連港的國際化，以及要求外蒙古的永久自治，尚需相當口舌。關於想恢復帝俄時期在中國所獲取的北滿、南滿的鐵路權益，與旅順軍港的租借，那亦是另外一回事。英美基於戰後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國，在東北享有完整的國家主權，對蘇俄的上述種種要求的讓步，自難實現。尤其當會議進行決定時，基於中國並無代表參加，對蘇俄的要求自可加以否決。」

桑姆納威爾斯的這一看法，的確書生之見。他並且說他一直沒有改變這一看法；因爲史大林如果知道尊重一九四五年六月與中國國民政府在莫斯科所簽訂的條約，這個條約就是將雅爾達協定中的決定，作了細節的商訂；那麼這個條約豈非就是爲中國的統一而鋪路，進而創建一個戰後強大的中國。

桑氏又謂，此可回顧在雅爾達協定簽署之六個月後，杜魯門總統派遣亨利霍浦金斯到莫斯科

協商有關問題，霍氏將協商經過電告華府：

「史大林堅決表示，他將盡瘁致力促成中國在蔣介石主席領導下的統一大業。他並進一步表示，蔣氏必將於戰後繼續領導中國，因爲中國尚無別人可出其右；特別指出中共的頭目，尚不足以統一中國……史一再重申其在雅爾達協定中所提出的主張，即他希望有一統一穩定的中國，並希望中國確實控制整個的東北，以爲中國的一個部份……他同意美國『門戶開放』政策，也同情美國在戰後爲唯一經濟援助中國的強國。蘇俄亦將在未來的多年中，埋首其國內的經濟建設。」

桑氏是羅斯福的密友，他著書立說的本意，就在爲羅氏開脫、洗刷、平反一般人對他的批評；倒是前述巴德溫的見解，尚獲我心之同然，即羅斯福並不能辭其咎。所以，桑氏特別在他的書中，指責巴德溫認羅羅斯福在雅爾達所作的決定，即可或否「造成蘇俄爲一太平洋的強權國家」，不切實際。因爲一個世紀以前，蘇俄就已成爲太平洋的強權。所以一九四五年，蘇俄以一個戰勝國的姿態參與謀求世界和平的會議，豈能想像蘇俄會溫和容忍會議否決向戰敗的日本取回以前的失土？同樣不可思議的，就是蘇俄表示尊重中國的獨立與完整，並欲促成中國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完成統一大業；羅斯福爲願及中國未來的安全，又如何能够峻拒俄國索還領土的要求。還有美國不能無視於蘇俄穩定歐洲及遠東的力量，以及一九四五年的西歐的公共輿論，熱切渴望與蘇俄合作的成功。惟桑氏對羅斯福默許蘇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感到遺憾；同時他深信羅氏相信彼

時軍情緊急，由於聯合參謀軍事首長的報告，以及對中國的利益，需要獲得蘇俄的承諾，而使羅氏在戰略與政策的考慮上，作了他的抉擇。

桑氏並以李海上將對雅爾達協定的記述（

取自 Leahy, William, I Was There 一書，第三一七頁）作為對巴德溫質疑最佳的答復。

李海將軍如此綜述：

「（一）蘇俄是英、美的盟邦，直到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才力戰殲滅了德國的陸軍雄師。

（二）盟國憂懼養生，高階層人物恐怕蘇俄與德國製造隔離的和平，特別是英、美盟軍在一九四三年，無力開闢第二戰線；結果證明，乃屬無稽之談。因為蘇俄都遵守了在此時刻之前與盟國所簽訂的一切軍事協定。

（三）至於政治的協定，直到雅爾達會議，才達成第一個主要有關戰後世界的諒解。蘇俄由於對組織聯合國問題，贊成法國對德國控制意見；同意在重組波蘭及南斯拉夫政府方面，表示妥協的態度。事實上，幾乎對每一個政治問題，經過與會人士有力的陳述後，蘇俄總會表現相當的讓步，以使達成協議；此種表現，至少書面如此。」

桑氏接着自問，何以後來英、美與蘇俄之關係，自一九四五年春季以後，每況愈下，循至整個遠東鬧得赤焰漫天，一發不可收拾。他以為那是羅斯福總統自雅爾達會議歸來，即已感到史大林的國內至尊地位，於德黑蘭會議以來，有着顯著地改變；如在德黑蘭會議席間，史作任何決定時，從不猶豫，並沒說過某事尚待與蘇俄其他有關當局研商。然而在雅爾達會議時，史已不復再有如

此氣象；羅乃感到這是蘇俄紅軍將領，對史已發生甚多的影響了。因為從那時開始，有許多跡象顯示蘇俄所設計的政策，都是討好牽就紅軍，例如史個人對外的名義，便冠以「元帥」頭銜；對軍事作戰鼓吹制度的建立，甚至恢復沙皇時代最高將軍的稱號；史也開始將傳統的沙皇帝制精神，注入他的外交政策之中。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對蘇俄人民發表的文告字句。宣稱日本投降，以肯定的語氣告知亨利霍浦金斯：

「蘇俄人民必須獲得一個如何參加對日作戰的好理由」。亦是巧妙迎合鼓舞紅軍的士氣，那就是史說：「一九〇四年蘇俄軍隊的戰敗，所留在蘇俄人民腦中痛苦的回憶與污點，蘇俄人民相信有朝一日，可以向日本洩雪此恥。老一代的蘇俄人民，業已等待了四十年就是企盼今天的來臨。」

可是，史氏的這一口腔，與列寧生前認證一九〇四年的蘇俄戰敗，乃是給蘇俄無產階級帶來喜悅，因為這表示蘇俄將快獲得自由。其間為何有此顯著的差異？豈非適足以證明這是史大林惟恐蘇俄政府與紅軍之間發生分歧，所運用的戰略號召。

華府軍頭誤了韓國

又在閱讀亨利霍浦金斯一九四五年六月，他與史大林談話的紀錄，提到史大林對世界局勢的看法，特別具有濃厚職業軍人的看法；同時西方世界對史大林反對英、美的口腔，日益增加抱怨的憂懼，却為華府所忽視。既是後來華府與倫敦在波茨坦會議時。或更早以前欲消除蘇俄及西方

列強的分歧所作的努力，已成不可能之事。譬如史大林會同意對韓國的託管，應由美、蘇、中、英四國共管。他也同意羅斯福的建議，迫日本戰敗撤退韓國後，不得有任何外國的軍隊駐紮韓國。可是當德國戰敗，日本投降的那幾個月中間，美國國務院竟至毫無一點遠識，不能預見，若非在戰勝日本之前，與蘇俄就韓國有關戰後事項作一明確協定，其後必至使韓國分裂為二。

其後，日本戰敗，準備投降，華府的作戰部及五角大廈的官員，躁急地建議以在韓國境內的卅八度線為界，蘇俄在界限以北接受日軍投降，美國則在界限以南受降。當時為何劃分卅八度線，據華府官員說，是為了方便。桑姆納威爾斯乃感嘆這些官員的作法，簡直是無知、糊塗。他們事先不去請教行政部門的負責官員，如此疏忽了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慮，真是可悲的大意。但是重要的，是當蘇俄還未採取行動之前，發現錯誤加以補救，並非不可；惜乎白宮、國務院及作戰部，沒有一個單位想到迅速予以補救，而致快速形成了韓國的人造邊境；由於這一道不相溝通的籬籬，日益增長了美、蘇的仇恨。一九四六年，北韓共黨在蘇俄紅軍羽翼下，終於成立了所謂的「人民共和國」。

美國行政部門對南韓的檔案紀錄，並不愉快；他們怪責美國所欲在此建立的自由政治制度，遭致慘敗。實因韓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不能與美國有效合作，既是在困苦奮戰中，也不能為其國家帶來和平與繁榮。既之足夠的軍力以安內，又乏勇氣實現積極而遠大的改革。祇是飽受北韓

共黨的宣傳與顛覆戰略的一再挫折。所以，可知當年策定美國外交政策的人，似乎命定忽略了韓國對中國的根本重要性。即任何強權對韓國的控制，都將威脅中國的獨立與極端危害中國人民。美國應預知，列強共同協議的託管韓國，需由中國參加；但其間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使中國免於赤化。反之，可在歷史的推演中，由一九四五年迄於一九四八年以前，人們都可預料到史大林必然違背他與中國國民政府訂於一九四五年的「中蘇友好條約」，以及撕毀他向美國所擔保「支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諾言；不旋踵間，韓戰亦迫在眉睫了。

揭開歷史的真面貌

歷史上的事件，真是無獨有偶；日本可以違背國聯莊嚴的義務於前，即曾拒絕國聯當局對日本所託管在太平洋島嶼的調查；蘇俄亦違背聯合國的義務於後，即拒絕聯合國委員會對其所控制的北韓傀儡政府的調查。故不難了解，英、美疏於預作對捍衛南韓的防禦措施，乃使蘇俄侵韓的步驟得逞。

桑姆納威爾斯對整個遠東戰後形勢的分析，雖然大體忠實客觀，惟其個人的觀點，總是在為已故的羅斯福總統徇袒辯護，因為他的根本觀念就在認定：戰後謀求一個安定的遠東，實不在重建戰後的日本，作為平衡蘇俄的力量；這並非羅的政策。羅的政策，乃在造成戰後統一的大中國，不為蘇俄及其他列強所控制；有關中國的獨立與完整，並應獲得一切列強的尊重。羅的政策

，乃在支援蔣委員長長的國民政府，以實現美國傳統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及全面和諧的目標。所可訾議的，祇是羅的政策，自其死後，迄未為其後繼者全心一意貫徹實施；特別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季以前，竟為其後繼者的一筆勾銷；復至一九四七年再為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作最後的棄之不顧；因為馬歇爾根本揚棄了魏德邁將軍的建議：美國應盡全力支援蔣委員長長的政府。桑氏最後就世界輿論對羅的譴責，提出兩點答辯：

(一) 羅氏至雅爾達會晤史大林與邱吉爾，就戰後的遠東達成協議，保證尊重現存的各種狀況條

件；羅氏那時不能確知其軍事顧問的錯誤；以及日本的投降無須蘇俄的參與。
(二) 衡諸當時的情勢，羅氏不能確知與史大林的合作關係的建立，在他一死，即行瓦解。因為一九四五年的冬季，羅氏尚與邱吉爾同一希望，蘇俄政府必會如大戰時期自始至終堅守諾言義務；孰料蘇俄政策作了根本改變。
桑氏這兩點答辯，令人看來無異承認羅斯福的錯誤。證明羅氏對戰後遠東問題的處理上，不僅不是高瞻遠矚，明辨禍、福、是、非的領袖人物，而且有些昏庸與剛愎自用。

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

浩然集

隆重出版

本全集二千陸百多頁，二千萬言，共收集①鐵血精忠傳增訂本②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增訂本③關山煙塵記增訂本④海隅叢談，等四冊豪華精裝，定價新台幣捌佰元（原訂價一〇〇〇元減至最低成本八〇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陸佰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